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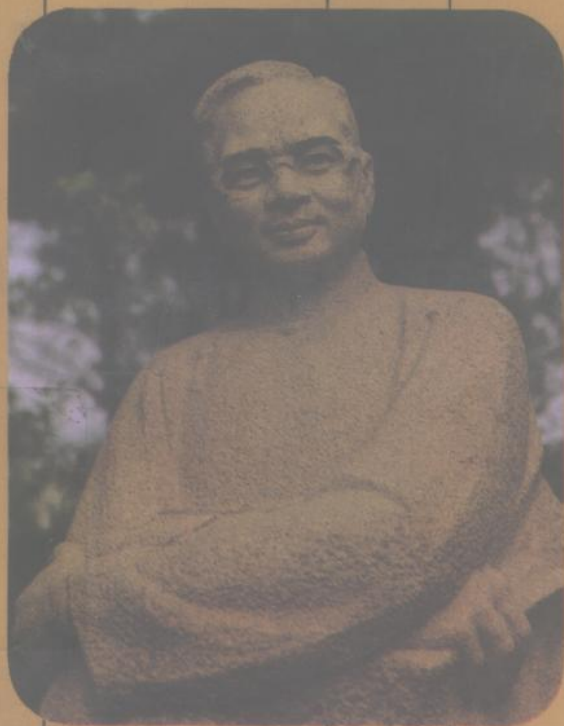
时代之子 吴晗

〔美〕马紫梅
曾越麟等
译校 著

无
题

吴晗六岁作

厨中无菜市上有
饮酒何必杏花村
人人谓我读书好
吾谓耕者比我高



时代之子吴晗

闻家驊题



◎「美」马紫梅 著

◎ 曾越麟 范道丰 译 曾越麟 校
张震久 王天惠 沙露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Mary Gale Mazur, Ph. D.

A Man of His Times: Wu Han, the Historian

根据马紫梅博士提供的博士论文打字稿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之子吴晗/(美)马紫梅(Mazur, M.)著;曾越麟等译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4

书名原文: A Man of His Times: Wu Han, the Historian

ISBN 7-5004-1900-7

I. 时… II. ①马…②曾… III. 吴晗—传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09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图: 4

字数: 374 千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04-1900-7/K · 300

定价: 25.00 元

出版说明

关于吴晗的传记曾出版过三部,一部是苏双碧和王宏志合写的《吴晗传》(1984年,北京);另一部是李又宁写的《吴晗传》,1973年由香港明报月刊社出版。还有一部是《吴晗自传》。现在由我社出版的这部《时代之子吴晗》是迄今第一本由外国学者撰写的。外国人给中国人写传记,并不多见。

本书作者马紫梅(Mary Mazur)女士是一位美国友人,她长期从事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曾就读加里顿大学和东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先后获得过芝加哥大学中国语言和文明硕士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博士学位。80年代一直在我国北京大学历史系进行学术交流,现在是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学者。多年来她就对吴晗及其所处时代发生兴趣,不辞辛劳广泛搜集有关资料,决心要写一部吴晗的传记,本书就是1993年她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答辩获奖作品。

马紫梅女士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她一方面在美国及其他地方收集资料,同时多次来华,跑遍我国许多高等学府、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单位,收集文字资料,同时进行采访,收集口头活资料。她在我国访问相关的人士,包括学术界、政界吴晗的同事、朋友、亲属不下百人,并曾亲访吴晗的老家浙江义乌,采访吴晗的乡亲,翻阅义乌地方志。书中的资料可谓丰富。

作者在书中不仅谈论吴晗本人,并广泛涉及吴晗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对一些问题探讨颇深,读

1783/15

者可以从书中了解一位外国友人，特别是一位美国学者是如何评价吴晗的，是如何看待吴晗所处的那个时代诸多人物和事件的。由于地域的隔阂，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各异，观察和评价事物难免有其局限性。作为一家之言，我们不必苛求其立场和观点。书中涉及的一些人和事，我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可能感到新鲜，会有兴趣的。

作者序

借助于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热情和组织工作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时代之子吴晗》即将问世;读者和作者都会感谢他们。漫长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后,三家村公司的几个骨干想为弘扬中国文化做些有益的事,于是约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邓拓诗集》、1994年出版了廖沫沙的《瓮中杂俎》,如今又组织了以曾越麟为首,由范道丰、张震久、王天惠组成的小组来翻译这本书。我十分感激三家村文化实业公司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选中了我写的这本传记。我谨希望这本传记的出版能为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作品以实现出版者崇高的目标。

当年,在中国以攻击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序幕,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今天我们出版《吴晗传》,只不过是事隔整整三十年之后反思当初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然而,我真诚地希望,“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也不会落到我们头上。也许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我们能更深刻地从多角度、多方面理解中国的过去,中国的文化以及它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价值。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吴晗实现他心中的目标,使中国在未来变得更加强大。

最后,作者得到民盟负责人俞泽猷和金若年两位先生的协助,请费孝通先生为本书题词,特此致谢。

马紫梅

Mary Mazur

于北京大学

1995年4月11日

推动一代知识分
子的进步

曹孝通



一九九五年四月

鸣 谢

在我开始考虑向帮助我写这本书的人士表示感激之情时，我不知怎样才能向玉成我计划的朋友们一一致谢，也不知道先向谁道谢，最后向谁道谢。应该有我的导师，他们对我研究中国时予以指导和鞭策；也有我的中国朋友，他们鼓励我着手写这本书，甚至提示开始写作的门路；还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厌其烦听我提出许多问题，而且还为我寻找各种资料；也还应该有我的家属，他们赞许和支持我这项繁杂的写作计划——这是拖住我离开他们而且看来是漫无止境的计划。还有许多中国人士，在我访问他们时，他们亲切和蔼地让出他们的时间，不吝追忆往事，让我使用珍贵的资料；还有美国和中国学术界的许多朋友，他们赞许和支持这个写作计划，他们给予我的友谊，坚定我完成这项计划的理念和自信。我要向所有玉成我的人士表达的谢忱，不可能在这寥寥数语中说清；而且也不可能一一说出所有曾经帮助我写作人士的名字来；没有应该先行道谢的人士，也没有最后才致以谢意的人士；但总是要有首先提到的人。

那么就让我从这个写作计划开始时讲起，开始鸣谢。我要向何芳和邓云道谢：是他们首先建议我选择吴晗传记作为我的论文题目。他们两人都难逃“文革”的劫难，他们完全清楚关于吴晗及其惨死的种种情况；同时，他们也知道强加于他们家庭的人为悲剧，知道在他们生活中发生的惨痛纷扰和可怕的后果。邓云是邓拓（与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合作者）的

长子,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丁一岚,她又向吴晗的家属推荐我,并介绍我认识几位政界要人。

我衷心感谢我的导师盖伊·阿利托(Guy Alitto):他让我按自己的思路展开写作计划,当作品一章一章地逐渐写成,送到他的案头时,他不吝时时赐教;当全书完成后,他热情的反响真使我铭感不已。戴维·T·罗伊(David T. Roy)对我的鼓励,连年不断;是他的鼓励,使我看来已不胜气馁时,又复振作前进;最后,他仔细地校阅我的手稿,指出不少错误。普拉森吉·杜瓦拉(Prasenjit Duara)作为我的学长,他的治学方法和教学经验是我的楷模,虽然我的工作和他的完全不同;我很钦佩他,他对这部传记作品提出了极有见地的评说。我的各位委员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谨此向他们致谢。

如果没有国家科学院设立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1985年—1986年的资助(该资助延长到1987年),我在中国从事学习研究就不可能进行,而这部传记实际上就会局限于靠出版的书面资料编纂成的知识性传记,而不是一部纵观生平的全面性传记。1990年,我得到私人设立的“黑兹尔·切尼基金会”(Hazel Cheney Fund)的资助再度访华;这次访问的成果是我得到一份未发表的文献。

对于我访问过的所有人士,我就他们花时间、费精神追忆过去,就他们的信任、赠送我资料、玉成我完成计划、对我表示的信心,等等,谨表深深的谢意。他们对吴晗的哀思,他们热爱祖国的情怀,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特别感激吴晗和袁震的家属:吴浦月、宋汝纪、吴宣、叶美英、吴浦星、袁溥之、袁熙之、容肇祖、吴璋、宋溥和其他人。

虽然按我的叙述可能会引起误解,会使人感到他人的帮助好像就不那么大,但我还是要向四位人士特表谢忱;他们对这本传记异常感兴趣,而且一直在鼓励和帮助我:邓拓的传记作者蒂莫西·奇克教授(Prof. Timothy Cheek),他向我传授

他的写作经验,倾听我的问题,鼓励我务必努力奋进;吴晗的传记作者、记者兼著名编辑苏双碧及其夫人、历史学家兼著名编辑王宏志都向我伸手相助,同我讨论和回答我的问题,向我提供珍贵的文件和入门资料;苏在多方面鼓励我写好这部传记作品,虽然他知道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之间的观点必然不同;当我们在讨论我们的传记主题的共同兴趣时,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充实了如饥似渴的历史学家的精神世界。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介绍我去采访不少我无法登门请教的人士;他始终如一地表示他对我的信心,而且不断地给我鼓励;他和他的夫人张玮瑛以及他们的家属给予我的友谊我将永远珍惜。

我还要向沙露茵深表谢意:我抵达北京之后不久,她到我在北京大学宿舍的小房间来看我。她听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顿时流露出忧愁不安的感情,不知所措,她成为我知心的朋友,像我的姐妹一样。对于她的帮助,对于她时时事事都在想着我,把我看作她家庭中的成员,等等,谨此向她表示我感激之情。通过她,我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人民,从而了解我本身。

还有很多很多人在不同时期都对我的写作计划给予帮助,但只能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士:唐晓峰、吴宣、宋汝纪、卜丽萍、周浩、邓壮、金以健、李安伯、车韦、许大岑教授、王天有教授等。

在研究中国的人士中,我要特别向约翰·伊斯雷尔(John Israel)和费雷德·泰维斯(Fred Teiwes)表示我的谢忱,他们给予我鼓励和批评指正。我的老师菲利浦·孔(Philip Kuhn)、苏珊·曼(Susan Mann)、威廉·帕里什(William Parish)认为我有扎实的基础来从事现代中国研究工作,他们引发我对社会史的诸多问题的兴趣。何炳棣对早期中国历史和明清史的巨大兴趣以及他钦佩吴晗对明史研究的贡献都大大地影响了我。赵志超(George Chao)、成央·博彻特(Cheng

Yang Borchert)、洛伊丝·富塞克(Lois Fusek)、戴维·罗伊(David Roy)以及米德尔伯里语言学院的老师们悉心培养我这个驽钝的学生;同埃伦·威德默(Ellen Widmer)、玛里琳·莱文(Marilgn Levine)、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的友谊,使我这个改行的学生——从生物学科改行学中国历史的学生的生活丰富多采,学有所成。

我在为这项写作计划进行研究工作时,我去过不少图书馆,得到他们工作人员的广泛相助:在美国的图书馆有: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及费正清研究中心图书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东方书库、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等等;中国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也给予很大的帮助;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内设立的大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是令人感到很惬意的工作地点。我特别感谢芝加哥东亚图书馆的两任馆长詹姆士·郑(James Zheng)和马泰来的帮助。

我要感谢的最后一位,也是首要的一位——我的丈夫罗伯特,他是本书不得不读的读者;他作为电脑的技术顾问,以其充分的机会实习他的技术而成为忠诚和耐心的入迷者;在我长期奋力工作时,他是一位长期受累并且有时不甚情愿的伙伴;我打从心底里感谢他。我的三个孩子——埃米、丹、史蒂夫都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们各有其生活和事业,而他们的母亲为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在磨炼自己的翅膀以图逐渐学会飞翔。他们理解母亲并以此而感到自豪;我要说的是“谢谢你们”。

我还要对那些没有在此提到姓名的人士致谢。如果没有这些人士的帮助,这部传记可能写不到这样的程度;不过错误应由我负责。

绪 言

吴晗其人

吴晗是以新史学方法研究明史(1366—1644)的中国历史学家;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他同时也是名噪一时的教授和杂文作家。1965 年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开始前不久,受到共产党最高层的公开攻击,这又使他在 21 世纪前夕大为增加了知名度。攻击他的藉口是他以写历史剧本《海瑞罢官》来影射批评毛泽东。而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破门而出”去写《海瑞罢官》的文学剧本正是毛泽东本人对他的指示要求,毛又通过周扬、胡乔木再三转达这一指示要求而做的。在那以后三年多,他受到诋毁,他被宣布为“反共老手”、“叛徒”、“特务”,被说成是中国及其人民的敌人;他在 1969 年被连续批斗而毒打致死于狱中,悲惨地结束了他可贵的生命。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危机中,吴晗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左翼的知识分子,他支持当时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组成的统一战线中的民主运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在这岗位上工作了十六年。

过 去

我们应如何了解过去？谁是名垂青史的历史活动家？他们与其所处的时代变迁的背景有什么关系？过去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名家曾作如下说明：

这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我们观察世界于局外，但我们把观察所得重现于局内。同样，我们有时审度过去，而这类过去的事正在眼前出现。那么日常经验赋予时间和空间的本来含义便丧失了。——马格里特^①

一般人所公认的旧式史书的缺陷，是依人、事、物、地的分别，硬把史料割裂，以致读者看了以后，对于历史的演化，既不能得完整的概念，而于各时代所承前启后的文化或文明，也不能有深切的认识。——吴晗^②

用什么方法和根据什么资料才能最好地审度过去？对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吴晗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他的传记作家来说，这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在

① 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 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富幻想，表现奇异，代表作有《风云将变》等。——译注)于1938年11月21日的演讲。

② 见吴晗著《李继煌译述的高桑氏〈中国文化史〉》，《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435页。

他的《约翰逊传》中,写到资料来源的问题和传记作者体现主题的创造力问题时,引述约翰逊博士的思想说,“人们的善恶之可以识别并不在其最高的成就之中,而更经常的是在那细微而不起眼的行为中,在片言只语中,或在一句玩笑话中,而不在巨大的攻城掠池的战役中,看出其真实的性格来。”^① 鲍斯韦尔用自己对朋友观察所得写成的《约翰逊传》,是对一些以某个主题的公开文件为基础但没有“视其主人公的行为举止”写成的传记的著作。在几个世纪前,雅克·德累达(Jacques Derrida)有如下的见解:“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用作传记的素材。”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之成为传记的最佳范例,是此书以生活素材作为主要资料。我要补充一点,这是由于认识到传统和社会习俗如何与过去熔合在一起的。在《约翰逊传》中谈到约翰逊说,可能收集到的丰富资料展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传记体“生活”画面:

如果生活延长到兴味羡慕都消磨殆尽时,便能寄希望予不偏不倚,但也稍许指望才智;因为使传记增色的事件是不稳定而且容易被遗忘的,很快就不在人的记忆中,于是就只有靠传说来表达了。^②

如果一部传记不仅仅是纯粹的年谱,那么约翰逊对资料来源和记忆问题的担心说明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远至二百年前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是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所关心的。作为历史叙述的形式,一部传记要求描写——也的确描写了

① 见鲍斯韦尔著《约翰逊传》(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04年)第24—25页。

② 同上,第25页。

——人物的性格，“人的善恶”，其程度或大或小，但反映作者及其资料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开始写吴晗传记时，从应该写他的什么事情来看，显然该写“文革”开始时对他的攻击，因攻击马上把他推到受国内和西方注意的显著地位。本来除一些研究明史的专家外，吴晗在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眼中不甚有名。一些想为他写传记的外国学者自然希望知道攻击他的意义何在。把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看成与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相似，就足以使轻易听信的中国以外的中国观察家认为吴晗一定是批评中国当局、持不同政见的民主派。比较中苏当时的情况并认为中国也有同苏联相似的持不同政见者，研究中国的学者毫不怀疑地相信攻击吴晗是那几年自然的结果。读过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 1891—1940)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人会得意地发现一位中国的批评家或持不同政见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中国人使用讽喻是名扬遐迩的，而且是言之有理的。西方关于文革的文献也谈及吴晗，他因《海瑞罢官》而突然被人注意，这是文革的副产品，而不是真正的吴晗本人的情况。最初的研究报告充斥着指控他的问题和“文革”的情况，不过集中于“文革”初期出版的文字资料和宣传文件。而且是为了对他定罪，进行的所谓“调查”而炮制的。

大约二十年之后，当我着手收集有关吴晗的资料时，有关情况看来不止是那部剧本。凡是涉及他的重要问题都不是以这部剧本为起点，或从这剧本去说明他以往的情况和重要性，而且确实不要相信“文革”初期炮制的资料所圈定的范围。吴晗生于“五·四”运动前的1909年，卒于文革中期的1969年，这六十年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重要时期，也是现阶段的重要时期。在20世纪这六十年的诸多事件中，漫漫的长河历史中找出他的适当位置，将会使人们了解“五四”运动初期的几十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之间的关系。我用传记体以吴晗生活的多变时代为背景,叙述历史的吴晗。他生命的终结是一个真实的人一生的生活主流中的末章,而不是简单的因他写了一部剧本而引发的唯一原因所转移的事件。实际上这部剧本正中诡称该剧影射批评领袖和党的意识形态的那派有权势的人的下怀。这部传记是从1909年写起,到1949年为止,记述吴晗在这期间的生活和思想活动情况。

资料来源

如果政治调查报告和文革的批判文件是有偏见的资料,达不到了解吴晗的生活的目的,那么有什么资料足以成为表述他的生平的基础呢?任何传记都只有经传记作者用资料敷衍成书。塞缪尔·约翰逊说得好:靠流传的文字资料即文献或学者著作写传记,只能写出平铺直叙、深度广度都有限的作品来。用这种方法来写吴晗的传记,其结果会把这个才子写得飘忽不定,和真实的生活环境脱节,不能正确表现他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的形象。更糟的是,如果不用其他形式的资料,他在四十年代开始参与的政治活动便无从全面探索,从而把他的生平歪曲了。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政治气候起了基本变化;80年代,另一种形式的资料如追忆和悼念一些名人的文章可供利用。用文章怀念、悼念死者的生平,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种追忆和纪念体裁的文章重新出现,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史料。70年代末,文革中许多打进牛棚受到非人待遇的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昭雪,接着涌现出许多表达哀思的文章和文集,以纪念、缅怀受到诬陷的朋友、同志或家庭

成员,并推倒对他们诬陷的不实之词。这番平反昭雪文章纷纷刊载,也以知识分子、政界和出版界的鼓励,用个人追忆受害者的回忆录来填补这空白。至于吴晗的传记,因为他的生活与各种社会政治环境及各界人士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显得很多,是丰富的资料来源。

虽然可以采用的回忆文献不少,但传记作家如果局限于文字资料,与其写传对象生平所处的文化自然环境相脱节,没有访问熟悉这位对象或与他有共同经历的人士,那么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其对象生平的复杂性。此外,假设一位有血性的人只不过用一堆文字就可以表述清楚,那么这种做法未免太轻率了。80年代中期,仍然有不少了解吴晗各个时期生活的人健在;作者利用这个机会采访他们,可以从活的资料来源,收集有关吴晗的材料。同时还能得到某些特殊的东西,矛盾主题以及思想情调的联结,还有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这几十年间吴晗生活活动不断变化的背景,足以成为这部传记的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口头采访在各种环境中了解吴晗历史的人士,参预构成了他生活主体的网络,并采访了与他有同一生活背景的人士。这样,使作者我本人在特定意义上也成为他密友中的一员。

本书的目的是要把他视作完全的复杂的人,不单单是在扮演“叛徒”、“持不同政见者”、“英勇的殉道者”的角色中的知识分子。吴晗不仅是卷入内战的政治旋涡和参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明史专家,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度过他生平的主要时期。因此,研究他的生平就要访问与他有过接触的政界或非政界的各方人士。所以,吴晗的著作、采访资料以及追忆和纪念文集乃结合成本书的基本素材。

为了实现这种研究,作者访问过八十多位人士,开过一百二十位人次以上的几次座谈。访问地点包括北京、昆明、成都、